

人工智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戚聿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性最广泛的关键共性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引领技术，也是替代性最强的颠覆性技术，在现代工程技术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应用步伐，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人工智能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工智能迎来了创新成果群体突破、集中爆发的时期。人工智能最新成果主要集中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演进方向是超级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属于通用目的技术，可以链接、渗透、赋能万物，在算力、算法和数据上展现出的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是以往任何技术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历史上前几次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身体和器官的释放和解放，此次人工智能革命释放和解放的是人类的脑力和智力，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将带来全面、深刻和持续的影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不仅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而且对经济发展正在产生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的深刻影响。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可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庞大冗长的产业链群，并且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相互加持，以其“迂回生产方式”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叠加、倍增等“乘数效应”。仅就芯片制造这一环节而言，芯片生产线涉及50多个细分行业、2000—5000道工序。并行计算的“万卡集群”正在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的标配，带动智能算力、算法和数据的产品化和规模化，推动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过去3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18%、

13.9%，2023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784亿元。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更是以其强大外溢性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2012—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2万亿元增加到53.9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5.3%，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21.6%提升到42.8%，2023年数字经济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5%，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的强大新动能，更是在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将被激发出新的活力，对社会总需求产生强大、持久的带动作用。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一系列新消费，促进了消费升级进而带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将带来新一轮“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新基建”更是直接刺激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人工智能赋能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便利商品和服务“出海”，促进出口需求提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强大经济基础。

人工智能是加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随着经济发展，由于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效应，必然引发产业结构升级。而随着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也由初级需求向高级需求不断转变，产业结构也由此表现为从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再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2012年到2023年，我国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从9.1%下降到7.1%，第二产业占比从45.4%下降到38.3%，第三产业占比从45.5%上升到54.6%，反映了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从技术进步效应看，产业结构升级反映在各个产业部

门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主导产业不断由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技术产业向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2013年以来，我国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其中多半是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所致，反映了产业结构不断趋于高度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技术研发范式，促使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发现和发明效率极大提升，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技术基础。人工智能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将企业“人、机、料、法、环、测”整个生产体系数智化，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大幅提升，并且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赋能再生产各环节的有机衔接，促进形成定制化生产方式，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微观基础。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催生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及其产业链成为技术密集型的“头雁”产业链链，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关联效应，助力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程，实现产业智能化，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人工智能是完善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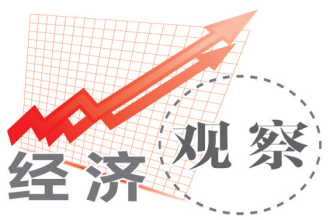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为前沿的关键共性技术，可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高精尖技术基础。从现实来看，无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还是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型储能、未来显示（如全息显示、视网膜显示）等未来产业，几乎

所有产业的技术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化、产业化、规模化，将带动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数智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将会使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活力。例如，大力普及“无人农场”等智慧农业，加快发展“黑灯工厂”等智能制造，超前研发养老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各类服务机器人，不仅有助于提升生产经营效率，而且有助于解决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等带来的社会“卡点堵点”问题。无论是智能产业化还是产业智能化，都离不开数智化基础设施的坚强“底座”。

因此，要及时将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保障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数智化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连接设施、感知设施、算力设施、数据中心、卫星通信与量子通信设施等。与此同时，电网、铁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也都需要数智化升级换代。超前建设数智化基础设施，同时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可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其运营提供强大的“底座”支撑。

在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中，我国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超前布局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赢得国家竞争新优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更早时候，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一结束，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会议精神、回应经济热点问题时称，“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近年来，在部分行业和某些领域确实存在着“内卷式”恶性竞争，给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带来不利影响。

“内卷”一词出自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形容一种“很辛苦又很不经济”的模式。“内卷式”恶性竞争是指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为了争夺市场、排挤对手，试图通过无限制地压价来获取短暂竞争优势，结果却使各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换来的不是自身境况的改善，而是行业整体发展环境的恶化和各自生存压力的增加。“内卷式”恶性竞争颇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因为不合作，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进而使集体利益受损。

引起经济领域“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容量有限的市场促使一些企业为了生存，通过“价格厮杀”、“山寨”模仿先进技术等方式争取订单和市场份额。我国生产的摩托车曾风靡东南亚，一度占据越南80%的市场份额，但因企业竞相压价、恶性竞争，产品质量却跟不上，最终风光不再。一些稀土企业也曾因恶性竞争、相互压价，而导致我国稀土卖出“白菜价”，造成巨大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二是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一些企业的产品在性能、品质、售后服务等方面与竞争对手高度雷同，又不能在细分市场上立足，只能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三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起产能扩张过快。不少地方为了抢抓“风口”，一味上马新兴产业，结果造成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等问题。四是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一些地方人为设置市场壁垒，如不允许外地企业参与当地的招标等；还有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争夺投资项目，违规实施税费、用地等各类优惠，人为制造“政策洼地”，使招商引资陷入盲目无序，干扰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这样既会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也会加剧产业同构与价格“内卷”。

在“内卷式”恶性竞争下，相关企业举起低价格大旗。低价格往往意味着低成本、低质量。为了压低成本，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会想方设法将一部分成本转移给上下游企业承担，给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打价格战的企业由于利润微薄甚至出现亏损，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资金用于研发、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受损的是广大消费者。防范“内卷式”恶性竞争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首先，合理制定招商引资任务目标，加强招商引资队伍建设，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重点加大对项目落地的考核力度。其次，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加强对招商引资风险的防范和规避，引导基层政府在重视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质量、重视实绩。再次，加大对各类招商骗局的查处力度，严格限制“超常规优惠”“抽屉协议”“隐形补贴”等，尽可能消除企业“换个地方拿补贴”的空间。最后，当前正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也要加快一体化政务的构建，以缓解招商引资内卷现象。

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充分发挥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规范企业在

有效防范『内卷式』恶性竞争

□ 谈儒勇

市场竞争中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和“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中，可考虑纳入“内卷式”恶性竞争相关条文，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法律支持。《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在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下一步应重点抓该条例的落实，做到各地在执行过程中统一尺度。

发挥行业协会在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行业协会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力量，还是推动行业管理、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信息与支持、引导企业走向市场与国际化的重要平台。通过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建立投诉机制、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协助政府监管以及倡导长期主义发展理念等方式，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比如，行业协会可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政府部门、学界等合作，对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行业开展前瞻性研究，进行市场合理产能的预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起到信息引导作用。

转变企业的经营思维。对企业来说，彻底摆脱对“卷”价格的路径依赖，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卷”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上。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消费升级，低价格低质量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部分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引领消费潮流，通过产品创新实现“供给创造需求”。此外，企业要实时研究市场需求动态、追踪市场动向，合理布局并适时调整生产规模，遵循“需求牵引供给”的规律。

（上接1版）国家能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很大程度上要看能否坚持好和完善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起来，不断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全面推进和重点推动相结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完成好以下重点任务。

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着眼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治层面稳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涉企收费长效机制

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入推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努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统计制度对树立正确政绩观、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

标核算体系，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健全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加强新经济新领域纳统覆盖。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充分发挥大国内需纵深广阔的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释放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发展动能。一方面，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完善“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政策环境，规范压减对消费的限制性措施，对可以依靠市场充分竞争提升供给质量的服务消费领域放宽准入限制。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和补短板建设。统筹“硬建设”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建设。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完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重点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